燕齐通衢垛石桥(三)

◎范继国 柳君 垛石街道垛石村印记

南圩子门遗址

南圩子门遗址位于村子南端。此门于民国时期修建,修建目的为防盗防匪。六十年代时被大水冲没,现为荒地。

燕墩湾

燕墩湾又称燕子湾,位置大概在村子中心偏南位置,因形状似燕子而得名。燕子湾的水来源于齐济河,始于宋朝老百姓因取土而开挖形成,至今仍在使用。

垛石完小

济阳区垛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原垛石完小),是济阳区早期规模较大、规模较全、师生人数较多的学校之一。据旧县志记载,垛石完小的前身为济阳县第五区小学。始建于民国二十年四月,这年区长付子安(字万全)倡导在垛石桥镇设学。公推后楼村开明大地主周建昌筹备,周任董事长(旧称校董)兼校长。借周宅庆乐堂做教室(街里供销社)。省吾堂为宿舍,并择定该镇宏济寺旧址为体育场(今幼儿园驻地)。是年九月开始招生,计划高级班两个,初级班一个,学用新学制教科书,设国语、算数、地理、历史、常识、体育等课。十月份开学授课,学生100余人,聘任教师6人,有魏丙南(青州),勾子林(临朐)及本县的赵德明、赵修美等老师,办学经费由县投资与群众集资相结合,全年经费2700余元(银元),校长、教师月薪20—35元不等,校长周建昌、区长付子安等人办学均颇尽力。

民国二十四年,聘昌邑人肖书敬(字秉鑑)为校长,肖校长治学严谨,办学有方,在宏济寺旧址(现幼儿园驻地)建起新校,规模逐渐发展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1937年日本侵略者进入垛石地区、学校被迫停办,1942年又由孟泽洪(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宋竹村等人带头,聘请杜干、高会清、郭登五、田玉英等教师办起了垛石完小,第一年三个班,学生120余人,1943年聘本县牌坊赵高厚斋为校长,规模逐渐发展到一至六年级,另有两个补习班(高小毕业学习初中教材),教师十四五人,学生200余名,1944年春垛石解放,但由于政治不稳、学校又停办,秋后经群众一再要求,栗逢详、杜善利、田玉英三名教师又办起了四五十人的复式班。1948年济南解放后垛石完小在本镇洼子村恢复,1949年冬由校长张乃忠带领迁到垛石桥,在小学原址开课。

解放后,在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垛石完小越办越大,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大批人才,自1949年至1994年历经十六位校长的领导,学校由小到大,由原来的30余间校舍占地5亩、学生300余人。教职工十五、六名发展到现在73间校舍占地15亩,学生600余人,教职工30多人,教学仪器齐全有13个教学班的完全小学。1996年,为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改善办学条件,学校有扩地9亩建教学楼一栋。学校自1987年东搬入新社(原镇中学驻地)后根据县教育局的要求更名为垛石镇中心小学,2020年6月随着垛石镇改称垛石街道办事处,垛石镇中心小学改称为垛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唐槐

唐槐位于村子里的垛石街的中心位置,据传是由唐朝传下来的大槐树,距今约1300余年。唐槐古朴高大,盛时树干有十几米宽,需众人合抱才能完全环住;树冠遮天蔽日,树根外露于地面。历经千年风吹雨打雷击,树心逐渐从上到下枯腐成洞。底部树洞内能容数人,树荫底下能坐10个班的学生;顺洞爬到树顶也能容下两人。2002年5月的一场暴雨,彻底吹倒古槐,古树逐渐凋零,现在只能从村民提供的老照片中探得古槐繁茂时的样貌。但所幸不久古树根上又生出茂盛的新枝,可谓"枯木逢春"。现在新长成的树木和古木的枯枝干周围筑以圆形花坛,被一同保护起来。

垛石河

垛石河原名叫齐济河,源流于现起步区齐河、孙耿境内,建国初期,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泄洪的水向北顺洼北流,见湾进湾,见洼进洼,一路弯弯曲曲地流向垛石村西排进徒骇河。1953年发的一次大水后县里动用民工对齐济河进行了疏通,并在垛石桥村西与孙家村东接近徒骇河的位置修建了一座小砖桥,方便河西边的人们赶集走动,到了1961年夏天洪水把小砖桥冲垮了,阻断了人们的通路,人们来往只得靠小船行渡。1962年县水利局成立指挥部,春季开始备沙石料于秋季调用本公社民工,并招来石匠在县水利局技术员李新生的指挥下修建了一座3孔石桥名曰"齐济河幸福桥"。但此桥自1964年起连续四年每逢大水就把这座桥淹至洪水中,1965年县水利局又重新设计,让齐济河进行了改道,从南边的大安家村直到垛石村又开拓了河道,这段河被改名垛石河,自此以后才彻底消除了水患对这区域人们的危害,自2019年起,区水利部门又动用大量机械对垛石河河道进行了疏通。

涵洞

为了排洪、蓄水,1965年上级水利部门在本村修建两个节制闸涵洞,均位于徒骇河南大堤上,在村子西端的涵洞由于修建于孙家村后,上筑有"孙家涵洞"四个字;另一个建在现镇政府大院西北位置。两处涵闸,几十年来一直为垛石村及周边村的蓄水灌溉及及泄洪防涝,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历史传说

天下第一砣

相传早年徒骇河大水将垛石桥冲毁,两岸交通阻隔,"燕齐通衢"迟迟梗阻,惊动了朝廷,便责令地方官限期复桥。无奈之下,幕僚们想出一策。四方邻县,张贴布告,宣称"高价收购石料",以质论价,以斤定价。于是宣称"一两银子,一斤石头"。很快许多商人运来大量石料,有人还送来两对样式别致的石狮子。但当石料过称时,一块上百斤的石料,变成了几斤。原来是经办者在称砣上做了手脚,制作了一个特大的秤砣,商人干脆顺水推舟,算作义举罢了。从此,"天下第一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下来,垛石桥是向北京运送物资、银两的重要交通枢纽。

杜翰三告御状

据《济阳县志》记载,顺治十五年,山东遭受百年难遇的旱灾,饿殍遍野。山东巡抚耿焯却向皇上谎报山东无灾,还下令按时缴纳赋税,激起民愤。杜翰三是当地的一名私塾老师,得知此事后,非常气愤,立即联合十余人进京告御状。耿焯得知,连忙派人去京城告知其同党,并一路追杀,最终只剩杜翰三一人抵达京城。杜翰三刚到京城,便被关进大牢。狱卒在得知杜翰三进京缘由后,对其义举深感佩服,问他在京中是否有熟人,愿代他传信告知,杜翰三说:"我曾教过一个学生,名叫艾元徵,在京中做官,可代我传信给他。"艾元徵(祖籍孙耿街道)当时只是侍讲学士,没有参奏之权,艾元徵将此事告诉了御史冯班。冯班听闻,立即上奏,顺治帝听后,大怒,立即下旨严查。杜翰三最终洗冤出狱,耿焯被押解进京,斩首示众。

历史人物

杜镇裕:字翰三(1601—1678)享年77岁,自幼聪慧过人、好学上进、立志读书成名、忠君保国。14岁时即熟读四书五经,以及诸子百家,考取秀才。以后读书更加勤奋,满腹经纶,博得了"才子"雅号。但时值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吏昏庸,国势日颓,外有清兵侵逼,内有庶民起义,他忧国忧民,所以,在历次考试中,为文每每砭时弊,直抒胸怀,愤懑之情,溢于笔端。主考官员责其文章"过刚",予以否贬,以致屡试败北。杜翰三见壮志难酬,报国无门,便放弃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在乡里设私塾教书。他学识渊博,"才子"之名久以广传,因而不仅是本县甚至齐东、邹平、长山的学子们纷纷慕名而来。他诲人不倦,严以深读,所以他的学生也大多才学出众,最有名的弟子是成为清朝刑部尚书的艾元徵。

杜曰诗、杜能礼(出生年代不详)均是清朝时期的两位监生,历史上奠基本村的杜姓两位功臣,为打造良好的村居环境,两人曾率领200多名乡亲因地制宜,自力更生,开渠挖沟,修建杜家水口,历时2年终于修建成功。使得本村水旱两路,交通便利,成为各路商贾集货分销的重要集结地。也为今日垛石桥村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迁(1899——1990),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受少帅张学良的资助与其他39位智慧青年赴德留学,归国后参加过西安事变,1949-1950年在北京南苑机场任过航空教练,后任过北京三中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教授,1900年病逝于澳大利亚墨尔本,享年91岁。

杜民1921年出生,山东吕剧早期的骨干导演。集导演,编剧,作曲于一身,思想新锐,创作内容新颖。他参与导演了《李二嫂改嫁》《小姑贤》《王定保借当》等多部吕剧作品,其中《李二嫂改嫁》对新婚姻法的实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文革"时,杜民被打成右派遣回原籍,逆境中他依然痴迷吕剧创作,1973年,自编自导了《喜事新办》,改编了《送货路上》等作品,深受家乡人民喜爱。

杜善平:1923年出生,18岁参加革命队伍,1948年,随军南下,转业至浙江,曾任浙江省海宁县工会主席。

杜善庆:1924年出生,曾用名杜福安,1947年参加革命队伍,在解放军野战医院从医,解放后在医药管理局任职,后任泰安卫校、淄博卫校、济宁医专校长。

王良民:1921年出生,1939年参加革命,1949年——1952年曾任济阳县组织部长、1952年7月——1954年9月任济阳县副委书记、县长,后调泰安地区任副专员、农委主任。

卢荣富:曾用名卢忠,1926年出生,1941年9月参加地下党组织,在白杨店村任教做掩护,1942年4月加入临邑抗联,任教导大队长(司令员徐尚武),转业前任师参谋长,转业至秦皇岛市任市纪检书记。

杜仁水1971年9月19日出生,1990年3月入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51344部队服役,199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90年-2003年,先后荣立三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集体三等功一次。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1992年12月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评委"英模代表"。服役期间,四次救了6条人命,他的见义勇为的事迹,曾得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北京日报》《大同日报》)《部队战友报》《大同广播电视周报》等媒体先后报道过。2005年10月专业至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工作,2018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村庄未来

垛石桥村作为济阳西北经济发展的重镇所在地,交通便利,特产丰富,颇负盛名,但不科学不规范的街道规划,一直是制约快速发展的屏障,虽有几次发展提升的构想,但受种种条件的约束,发展规划始终未能如愿。2020年冬季,在垛石街道办事处西侧不足50米处的徒骇河南大堤,成功探得丰富的地热资源,假如凭借此资源优势,再借助徒骇河自然风光,乘乡村振兴之东风,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建设打造一座集温泉康养、骇河旅游垂钓,周边名优农产品采摘的特色除此之外小城,垛石桥村会有脱胎换骨模样。此外,垛石村还有一个未来发展优势条件,目前正在施工建设的济南大北环从垛石村南穿过,并设立了一出入口及服务区,如工程项目完工启动,定可把"垛石驴肉","垛石小番茄"等地方名优特产传播更远。

(完)

作者系城区居民

"九一八"事变的真相

◎孙厚德(整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占领了整个东北,越发助长了它侵吞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

在九一八之前,蒋介石正热衷于所谓"第三次围剿",集中兵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进攻,顽固的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置日本帝国主义必欲吞并整个中国的阴谋于不顾,这是导致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原因。

那时的东北情况,自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东北军主力入关,坐镇北平,东北三省一时形成空虚状态。当时,在沈阳的中国军队只有驻在北大营的王以哲所部步兵第七旅的一个团,和在山嘴子炮兵研究班为教育演习用的炮兵教导团的一个团(拥有各种火炮三十六门),至于外城,驻在沈渝线和打通线上的步兵、骑兵不过四个旅。吉林黑龙江方面的步、骑兵,总共大约十个旅,且都是分散驻防,一旦有事,远水难救近火。除张学良留驻北平外,东北军的"边防"司令官都离开了本职岗位,吉林的张作相奔父丧回到了原籍锦州,其职务由参谋长熙洽代行,黑龙江的万福麟也随张学良进了北平,其职务也由参谋长谢珂(韵卿)代行。于是东北三省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何况日本方面早已洞悉:中国军阀军队向来是"勇于私斗、怯于公战"的。再就是东北的两条主要大动脉,操于日本和俄国之手,一条是苏联控制的中东线铁路(自满洲里至海参崴),一条是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自长春至大连),这条铁路虽然路线不长,但它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况且日本根据条约,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重兵,这就不啻在东北的心脏地区插入了一把尖刀,使中国守军长期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凡此,都予日寇以乘隙而入之机,遂于9月18日夜制造借口,首先侵占了沈阳。

张学良于9月11日,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12日去石家庄与蒋介石会晤,那天上午,蒋介石和张学良分乘两辆专车,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就这样两个人都未下车,把两辆专车合拢后,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那时何柱国正驻防在石家庄,得讯后提早在车站外围派部队布防警戒,以保安全,但专业及车站范围内,则均由蒋介石和张学良自带的卫队负责。

会谈后,张学良亲自告诉何柱国,蒋介石对他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见,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辩不清了。"过了一星期,九一八事变果然爆发了。

张学良下的一道道不准抵抗的命令的来源和真相就是这样,而张学良却替蒋介石背上了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

自从张作霖主政东北,一直到皇姑屯被日方炸车谋杀为止,经营了数十年的大好河山,不到四个月,就全部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有一次何柱国去北平向张学良述职,张学良对他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张学良几乎是垂涕而道,张学良本人内心深处的痛苦,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

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及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部署是这样的:1931年9月17日拂晓,日军在沈阳北郊八公里左右的柳条沟(在南满铁路沈阳站到文官屯之间),由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该地区进行警戒,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抓住了在该地区横跨铁路的农民八人,强迫他们穿上了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这时日本的工兵中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铁路。"不久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的应有下场。"同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计划好的炮兵阵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都安排了重炮,以沈阳站(当时日本人称为南满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这个发炮点既是突击的信号,也是火力最强的突击口。到"九一八"凌晨3时,这个指挥所打响了第一炮。跟着就是万炮齐发,射向沈阳北郊的东北军最大兵营——北大营。

当时我方驻军早已接到不准抵抗的命令,一枪未放就悄悄地撤退了。全师退却中,由于敌人的炮火猛烈,当时的伤亡还是不轻的,事后有一个统计数字,今已无法追忆了。东北军是分三路有计划地撤退的,大部分通过新民、打虎山,退到锦州,另一路退向铁岭、开原、去通辽,再一路是由辽中、营口、台安,退入山海关。

在"九一八"同时发动进攻的,除沈阳外,尚有满铁南线(沈阳到大连)沿线各县城,如辽阳、海城、鞍山、大石桥、复县、金县,以及沈安线的本溪、凤城,安东沿线各县城。长春以南的各县城,和沈大线、沈安线,离铁路线稍远的城镇,是9月19日开始进攻的。截至9月末止,除锦州以西地区外,辽宁全省沦陷,10月1日至10月末止,吉林省全部沦陷。到1932年初,整个东北三省,全部沦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日本关东军,实际于7月1日就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如调整指挥系统,加紧战斗演习等。到8月1日,又开始集结在乡军人进行夜战训练。他们的磨刀霍霍,与我们的麻木不仁,正好成了个鲜明的对照。

在"九一八"前,关东军的正规部队有10400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警察(满铁沿线的黑帽子及其狗腿子)约3000人,共计兵力23400人左右。日本的所谓在乡军人,就是在日本内地退役不久的现役军人。日本军国主义者,有计划地把他们安排到满铁沿线各站的铁路职工附属工厂工作,在"九一八"事变时,他们都参加了战斗,有的还当了参事官和附参事官。等到伪满洲国傀儡登场时,这批人更加飞扬跋扈,有的当了副县长或其他高级官员(伪满洲国的体制,是由日本一手制订的,明文规定:一切政府官员,正的都是中国人,副的一定要由日本人担任,实际上正的一切都要听命于副的)。

"九一八"事变前,我方在东北三省的兵力实际达30万人。除了进驻关内的部队外,在东北的军队还有26万多人。其分布情况为:沈阳北大营8万人,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吉林及黑龙江两省约各5万人,总计在东北的正规军达27万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及全国人民,对日军的狂妄侵略,无不义愤填膺,群情激奋,国民党当局,如能因势利导,命令东北军奋力抵抗,则两万多日本关东军何难给予致命打击而全部歼灭之。

蒋介石不此之图,反而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把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陷东北三省同胞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日寇的刺刀铁蹄之下,过了十四年的亡国奴生活。那时张学良是东北的统帅,守土有责,他盲目服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白白地断送了整个东北,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写到这里,还应当补叙一点关于东北军工工业的设备与损失概况。东北的沈阳兵工厂、迫击炮厂、火药厂等,是张作霖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我国最大、最新的军火制造工厂,所有设备均购自德国。当时投资累计超过一万万元银币,一切由杨宇霆总其成,有东方"克虏伯"的称号。"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就被日寇全部占领,库存的步枪87000多支,机关枪4000多挺,飞机200多架,及所有的粮秣弹药等,均被日寇抢掠一空。更为痛心的是,以后日军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时,所用的主要武器大半取给于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灾难,是无法单纯以币值来进行估算的。

在"九一八"事变时,何柱国驻防在石家庄,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何柱国奉命担任临永警备司(滦东),辖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与日本的天津驻屯军不断发生磨擦。自东北全部被日军侵占后,关东军大批开进山海关外沿长城一带驻扎。这样一来,何柱国的处境简直是腹背受敌,穷于应付,因为山海关外的日军是敌人,但有不准抵抗的上级命令。山海关内的日本天津驻屯军,是根据条约规定的合法驻军,虽张牙舞爪,屡次寻衅,却不能以敌人对待。何柱国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日军打了无数交道,左支右绌,真有心力交瘁之感,而最后的结果总是以我方的隐忍退让而告终。何柱国在无可奈何的特殊情况下,制定了不战、不和、不守、不走的"四不"方针来应付他们。可是日军把我方的隐忍退让,当作是软弱可欺,不断地提出无理要求,步步紧逼,我军在退无可退、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终于被迫奋起抗战,爆发了榆关之战。

由于我军被压制的敌忾心(包括何柱国司令本人在内),已到了火山喷发的时刻,是任何力量都遏制不了的。就这样,在我军的装备与人数均处劣势的态势下,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展开了极为激烈的殊死战斗。我军虽蒙受相当损失,但也给日军以很大杀伤(因为在这一线,并非是我军的主力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日军的真正目标是热河,所以榆关战事一结束,就扩大为自长城沿线至热河的抗日战争。这就是"九一八"事变。

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